

《蘭墩十詠》與《西洋雜詠》

域外漫筆

曾經先後擔任過英國駐華商務監督以及香港港督的漢學家德庇士 (John Francis Davis, 一七九五——八九〇)，在其《漢文詩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一書末尾，輯錄了兩組中國人吟詠英國的雜詩，一組是《蘭墩十詠》，一組是《西洋雜詠》。書中對這兩組詩的作者都沒有明示，但對兩組詩的出處有交代。第一組《蘭墩十詠》，據說其作者一八一三年左右會到訪英國倫敦，其詩最早見諸報刊記載是在一八一七年的The Quarterly Review。其實，這組華人吟詠蘭墩的詩，稍後亦會被收錄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道光甲午年正月號上，題名即為《蘭墩十詠》。德庇士的《漢文詩解》照錄了《蘭墩十詠》，並將其翻譯成英文——不清楚究竟是由德庇士翻譯的抑或是他同樣照錄了他人譯文。但德庇士提到這組詩的譯文在詩體語言上有些「散文」風格。而對於輯錄這組詩的原因，德庇士說是為了考察研究漢文詩歌的描寫手法或特點。對於這組詩，我曾在一篇討論《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的論文中引用過，這裡不妨再照錄一下，算是對這組較早遊歷英倫的華人的遊記詩的一種應有之尊重：

之一：海遙西北極，有國號英倫。
地冷宜親火，樓高可摘星。意誠尊禮拜，
心好尚持經。獨恨佛郎嘶，干戈不暫停。

之二：山澤鍾靈秀，層巒展畫眉。
賦人尊女貴，在地應坤滋。少女紅花臉，
佳人白玉肌。由來情愛重，夫婦樂相依。

之三：夏月村郊晚，行人不斷遊。草長資牧馬，欄關種棲牛。拾麥歌宜唱，尋花興未休。相呼早回首，煙霧恐迷留。

之四：戲樓闢永晝，燈後彩屏開。生且姿容美，衣裝錦繡裁。曲歌琴笛和，跳舞鼓簫催。最是詼諧趣，人人笑臉回。

之五：兩岸分南北，三橋隔水通。舟船過胯下，人馬步雲中。石橋千層疊，河流九派溶。洛陽天下冠，形容略相同。

之六：富庶煙花地，帝城雙鳳闕。人工開物華，雲樹萬人家。公子馳車馬，佳人曳縠紗。六街花柳地，何處種桑麻。

之七：高閣層層上，豪華帝宅隆。鐵欄傍戶密，河水繚牆通。粉壁塗文采，玻璃綴錦紅。最宜街上望，樓宇圖畫中。

之八：九月蘭墩裡，人情樂遠遊。移家入村郭，探親落鄉陬。車馬聲寥落，魚蝦價賤秋。樓房多寂寞，破壞及時修。

之九：大路多平坦，條條十字衢。兩傍行士女，中道馳騁車。夜市人喧店，冬寒雪積途。晚燈懸路際，火燭燦星如。

之十：地冷難成稻，由來不阻饑。濃茶調鴻潤，烘麵裏脂肥。美饌盛銀盒，佳醪酌玉卮。土風尊飲食，八席預更衣。

這種白描式的旅行書寫吟詠，頗有史料文獻價值。除了清晰地呈現了十九世紀初期一個華人知識分子遊歷英倫時的所見所感，更關鍵的是詩中所呈現出來的那種不預設任何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偏見」的開放與坦誠。詩中處處可見作者對於英倫實物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雙重肯定與讚美，甚至對家庭裡的夫妻人倫親和，亦多有譽詞，殊屬難得。當年的英倫報刊甚至傳教士們的華文刊物上刊載這組詩，大概與詩人這種開放自由的文化心態亦不無關係。

比較之下，《西洋雜詠》在寫作時間上其實與《蘭墩十詠》頗為接近。據考潘有度(一七五五——一八二〇)的《西洋雜詠》大抵作於其晚年。但無論就詩體亦或題材而言，《西洋雜詠》與《蘭墩十詠》均有不同。不過，當年中西匯通交流之初，雙方都有對內對外兩套不同語言的具體實踐。或許潘有度對內採用了「竹枝詞」這種摹寫異域風俗民情的詩體，而對外則採用了傳統格律詩，究竟與否，尚難說清。據說晚年的潘有度在經商之餘，觀史哦詩，亦多風雅。德庇士的《漢文詩解》中在介紹了《蘭墩十詠》之後，是這樣介紹《西洋雜詠》的：

同樣用韻文吟詠過倫敦的，還有一組詩，不過這組詩不光吟詠倫敦，而是吟詠整個歐洲，其作者是一位已去世多年的原廣州十三行的商人。此人儘管不是純粹的詩人，但其文學修養頗高，而且他還有一子在翰林院任職。據其本人所述，因為與外人打交道三十年，故頗為熟悉洋人，遂有這組描繪洋風異俗的雜詩以消磨晚年寂寞。

這種說法，反映出德庇士在分析解讀漢文詩的技術層面的技巧之時，對於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亦還是有所關注的。只不過，在那個華洋關係初開或尚不完全正常的時代，詩人們大多是在詩中有所保留的。比較之下，《蘭墩十詠》確實是一個意外，而《西洋雜詠》，就顯得中不溜秋，無論是他的所謂西洋觀還是詩歌技術層面的技巧。

同樣用韻文吟詠過倫敦的，還有一組詩，不過這組詩不光吟詠倫敦，而是吟詠整個歐洲，其作者是一位已去世多年的原廣州十三行的商人。此人儘管不是純粹的詩人，但其文學修養頗高，而且他還有一子在翰林院任職。據其本人所述，因為與外人打交道三十年，故頗為熟悉洋人，遂有這組描繪洋風異俗的雜詩以消磨晚年寂寞。

這種說法，反映出德庇士在分析解讀漢文詩的技術層面的技巧之時，對於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亦還是有所關注的。只不過，在那個華洋關係初開或尚不完全正常的時代，詩人們大多是在詩中有所保留的。比較之下，《蘭墩十詠》確實是一個意外，而《西洋雜詠》，就顯得中不溜秋，無論是他的所謂西洋觀還是詩歌技術層面的技巧。

這種說法，反映出德庇士在分析解讀漢文詩的技術層面的技巧之時，對於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亦還是有所關注的。只不過，在那個華洋關係初開或尚不完全正常的時代，詩人們大多是在詩中有所保留的。比較之下，《蘭墩十詠》確實是一個意外，而《西洋雜詠》，就顯得中不溜秋，無論是他的所謂西洋觀還是詩歌技術層面的技巧。

這種說法，反映出德庇士在分析解讀漢文詩的技術層面的技巧之時，對於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亦還是有所關注的。只不過，在那個華洋關係初開或尚不完全正常的時代，詩人們大多是在詩中有所保留的。比較之下，《蘭墩十詠》確實是一個意外，而《西洋雜詠》，就顯得中不溜秋，無論是他的所謂西洋觀還是詩歌技術層面的技巧。

這種說法，反映出德庇士在分析解讀漢文詩的技術層面的技巧之時，對於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亦還是有所關注的。只不過，在那個華洋關係初開或尚不完全正常的時代，詩人們大多是在詩中有所保留的。比較之下，《蘭墩十詠》確實是一個意外，而《西洋雜詠》，就顯得中不溜秋，無論是他的所謂西洋觀還是詩歌技術層面的技巧。

這種說法，反映出德庇士在分析解讀漢文詩的技術層面的技巧之時，對於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亦還是有所關注的。只不過，在那個華洋關係初開或尚不完全正常的時代，詩人們大多是在詩中有所保留的。比較之下，《蘭墩十詠》確實是一個意外，而《西洋雜詠》，就顯得中不溜秋，無論是他的所謂西洋觀還是詩歌技術層面的技巧。

這種說法，反映出德庇士在分析解讀漢文詩的技術層面的技巧之時，對於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亦還是有所關注的。只不過，在那個華洋關係初開或尚不完全正常的時代，詩人們大多是在詩中有所保留的。比較之下，《蘭墩十詠》確實是一個意外，而《西洋雜詠》，就顯得中不溜秋，無論是他的所謂西洋觀還是詩歌技術層面的技巧。

這種說法，反映出德庇士在分析解讀漢文詩的技術層面的技巧之時，對於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亦還是有所關注的。只不過，在那個華洋關係初開或尚不完全正常的時代，詩人們大多是在詩中有所保留的。比較之下，《蘭墩十詠》確實是一個意外，而《西洋雜詠》，就顯得中不溜秋，無論是他的所謂西洋觀還是詩歌技術層面的技巧。

曾經先後擔任過英國駐華商務監督以及香港港督的漢學家德庇士 (John Francis Davis, 一七九五——八九〇)，在其《漢文詩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一書末尾，輯錄了兩組中國人吟詠英國的雜詩，一組是《蘭墩十詠》，一組是《西洋雜詠》。書中對這兩組詩的作者都沒有明示，但對兩組詩的出處有交代。第一組《蘭墩十詠》，據說其作者一八一三年左右會到訪英國倫敦，其詩最早見諸報刊記載是在一八一七年的The Quarterly Review。其實，這組華人吟詠蘭墩的詩，稍後亦會被收錄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道光甲午年正月號上，題名即為《蘭墩十詠》。德庇士的《漢文詩解》照錄了《蘭墩十詠》，並將其翻譯成英文——不清楚究竟是由德庇士翻譯的抑或是他同樣照錄了他人譯文。但德庇士提到這組詩的譯文在詩體語言上有些「散文」風格。而對於輯錄這組詩的原因，德庇士說是為了考察研究漢文詩歌的描寫手法或特點。對於這組詩，我曾在一篇討論《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的論文中引用過，這裡不妨再照錄一下，算是對這組較早遊歷英倫的華人的遊記詩的一種應有之尊重：

之一：海遙西北極，有國號英倫。
地冷宜親火，樓高可摘星。意誠尊禮拜，
心好尚持經。獨恨佛郎嘶，干戈不暫停。

之二：山澤鍾靈秀，層巒展畫眉。
賦人尊女貴，在地應坤滋。少女紅花臉，
佳人白玉肌。由來情愛重，夫婦樂相依。

之三：夏月村郊晚，行人不斷遊。草長資牧馬，欄關種棲牛。拾麥歌宜唱，尋花興未休。相呼早回首，煙霧恐迷留。

之四：戲樓闢永晝，燈後彩屏開。生且姿容美，衣裝錦繡裁。曲歌琴笛和，跳舞鼓簫催。最是詼諧趣，人人笑臉回。

之五：兩岸分南北，三橋隔水通。舟船過胯下，人馬步雲中。石橋千層疊，河流九派溶。洛陽天下冠，形容略相同。

之六：富庶煙花地，帝城雙鳳闕。人工開物華，雲樹萬人家。公子馳車馬，佳人曳縠紗。六街花柳地，何處種桑麻。

之七：高閣層層上，豪華帝宅隆。鐵欄傍戶密，河水繚牆通。粉壁塗文采，玻璃綴錦紅。最宜街上望，樓宇圖畫中。

之八：九月蘭墩裡，人情樂遠遊。移家入村郭，探親落鄉陬。車馬聲寥落，魚蝦價賤秋。樓房多寂寞，破壞及時修。

之九：大路多平坦，條條十字衢。兩傍行士女，中道馳騁車。夜市人喧店，冬寒雪積途。晚燈懸路際，火燭燦星如。

之十：地冷難成稻，由來不阻饑。濃茶調鴻潤，烘麵裏脂肥。美饌盛銀盒，佳醪酌玉卮。土風尊飲食，八席預更衣。

這種白描式的旅行書寫吟詠，頗有史料文獻價值。除了清晰地呈現了十九世紀初期一個華人知識分子遊歷英倫時的所見所感，更關鍵的是詩中所呈現出來的那種不預設任何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偏見」的開放與坦誠。詩中處處可見作者對於英倫實物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雙重肯定與讚美，甚至對家庭裡的夫妻人倫親和，亦多有譽詞，殊屬難得。當年的英倫報刊甚至傳教士們的華文刊物上刊載這組詩，大概與詩人這種開放自由的文化心態亦不無關係。

比較之下，《西洋雜詠》在寫作時間上其實與《蘭墩十詠》頗為接近。據考潘有度(一七五五——一八二〇)的《西洋雜詠》大抵作於其晚年。但無論就詩體亦或題材而言，《西洋雜詠》與《蘭墩十詠》均有不同。不過，當年中西匯通交流之初，雙方都有對內對外兩套不同語言的具體實踐。或許潘有度對內採用了「竹枝詞」這種摹寫異域風俗民情的詩體，而對外則採用了傳統格律詩，究竟與否，尚難說清。據說晚年的潘有度在經商之餘，觀史哦詩，亦多風雅。德庇士的《漢文詩解》中在介紹了《蘭墩十詠》之後，是這樣介紹《西洋雜詠》的：

同樣用韻文吟詠過倫敦的，還有一組詩，不過這組詩不光吟詠倫敦，而是吟詠整個歐洲，其作者是一位已去世多年的原廣州十三行的商人。此人儘管不是純粹的詩人，但其文學修養頗高，而且他還有一子在翰林院任職。據其本人所述，因為與外人打交道三十年，故頗為熟悉洋人，遂有這組描繪洋風異俗的雜詩以消磨晚年寂寞。

這種說法，反映出德庇士在分析解讀漢文詩的技術層面的技巧之時，對於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亦還是有所關注的。只不過，在那個華洋關係初開或尚不完全正常的時代，詩人們大多是在詩中有所保留的。比較之下，《蘭墩十詠》確實是一個意外，而《西洋雜詠》，就顯得中不溜秋，無論是他的所謂西洋觀還是詩歌技術層面的技巧。

這種說法，反映出德庇士在分析解讀漢文詩的技術層面的技巧之時，對於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亦還是有所關注的。只不過，在那個華洋關係初開或尚不完全正常的時代，詩人們大多是在詩中有所保留的。比較之下，《蘭墩十詠》確實是一個意外，而《西洋雜詠》，就顯得中不溜秋，無論是他的所謂西洋觀還是詩歌技術層